

学界展望（文学）

〔日〕大木康 谷口洋 斋藤希史 田口一郎
上原究一 铃木将久
石 雷 译

导 语

众所周知，“学界展望”以往以各大学研究室为单位负责编辑，从今年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但是，在承担这个项目撰写的过程中，仍然本着以研究室为单位的原则，今年由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代表：斋藤希史）负责，并由相关领域的学者执笔和整理。

在开始本期学界展望的编撰时，我们以2018年在日本国内出版的单行本为中心，同时根据需要对超出这个范围的成果亦有提及。此外，本年度的分类为“总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诗文）”“元·明·清（戏曲小说）”“近现代”。除斋藤以外，执笔的学者按项目顺序，依次为：大木康、谷口洋、田口一郎、上原究一（执笔协助）、铃木将久。

一 总记

关于“总记”，并不拘泥于图书分类上的“总记”这一类目，这里会论及“比较文学”“日本汉文学”“书志学”的相关著作。

首先是井波律子《中国奇想小说集——古今异界万花筒》（平凡社）。这是由六朝到清末的26篇小说的现代语翻译和解读组成的选集，如果追溯

考察作者独特流畅的翻译,并分析其解说,即会发现讲述异界小说的谱系以及作者所论之“奇想小说”已成为中国文学一大支柱的渊源。不仅如《桃花源》《枕中记》《牡丹灯笼》这样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而且将由《枕中记》逆转而来的《欲望的噩梦》(原名《反黄粱》)以及作为19世纪后期小说中值得一读的《少女杂技师的恋爱》(原名《秦二官》)都纳入研究视野,并以此彰显近现代文学流变的痕迹,这便是这些小说和其他地区文学相通的所谓“奇想”。通过熟知这个作者之手笔,可以看出翻译是一种文学对外开放的作为。

中钵雅量《中国古典漫步 中钵雅量遗稿集》(汲古书院)由“中国古典散步”“敦煌歌辞译注”“敦煌文献的环境”“敦煌禅研究”四部分构成,由此可了解作者晚年全力倾注的敦煌文献研究的广度。正如编者田仲一成在“序”中所言,作者“既是文献学者又是民俗学者”,其学风体现在每一篇论述和校注中。作者没有局限于文学的意识,不仅将“文献”和“民俗”相关联,还以敦煌为中心,关注“禅”的接受方式。第三部“敦煌文献的环境”之标题也许为编者所撰,确乎为作者面对某个文献时,始终关注相关“环境”所致,由此引发对“口语”“民俗”“禅宗”的关心和兴趣。

以上两点均可视为中国文学的传播标志,而朴美子的《韩国古典诗歌的隐逸之心与生活——以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比较为中心》(风间书房)为我们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地域性。近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韩国古典文学(汉文学)的关注度持续高涨,但是以日语完成或翻译成日语的仍然不多。本书以“隐逸”这一东亚古典诗文世界共有的概念为轴心,关注中国和韩国的古典诗(汉诗)中出现的“隐逸”,譬如,关于对菊、莲喜好差异的探讨及研究“归去来”“渔父”等主题意象在韩国文学中的接受和演绎。此类研究可引发我们相应的思考。不仅在中国,古典诗歌在言语殊异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被广泛阅读和书写,这个现象耐人寻味,由此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古典诗歌的功能,与此同时,也为日本学者了解韩国古典诗歌的内涵及其特点提供了契机。

近年来,日本汉文学的研究不仅在日本国内,在国际上也受到关注,逐渐成为国际性的研究领域。尽管研究成果无法在这里一一罗列介绍,但是今年《怀风藻》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是不能不提及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土佐智子编著的《静嘉堂文库藏〈怀风藻笺注〉本文及其研究》(汲古书院)和《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年报》11期刊载的《怀风藻注释

稿》。前者是对静嘉堂文库所藏今井舍人(铃木真年)手稿《怀风藻笺注》(1865序)的翻刻和研究。《怀风藻笺注》是《怀风藻》现存注释中最早的,土佐认为,当时的《怀风藻》注释关注传记、历史方面,但是《怀风藻笺注》的注释倾向是,依据汉籍指出用例。

讨论铃木真年的研究虽已超出本栏目的范围,但对于正确把握《怀风藻》为8世纪东亚编纂的古典诗集,这样的注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这一研究的扎实和严谨也应得到充分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文献学研究的领域及其方法更加精细化的进程中,后者的“注释稿”(包括土佐在内的8人的8篇注释)同样有其意义。(斋藤希史)

关于书志学,应特别提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汉籍研究会编纂的《图书寮汉籍丛考》(汲古书院)。以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的住吉朋彦教授为中心的研究小组成员,使用科研经费,于2012年至2016年对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图书寮汉籍进行了调查和整理。同时,这项研究的成果《宫内厅书陵部收藏汉籍集览》还以数字档案的形式公开。此书收录研究会成员9篇论文,为纪念档案的发行而举行的座谈会的演讲记录,以及所调查的汉籍的图录编(奈良朝写经、汉籍旧抄本、宋版的三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登载彩色图版的图录篇,关于各书的详细记录,应该可以成为今后汉籍书志情报的龟鉴。

再将目光转向欧美,伊维德《中国文学中的老鼠与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目光所及从《诗经》《史记》一直到清末民国末期的宝卷和民歌,梳理中国文学中有关老鼠和猫的文学作品及其流变,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他还著有围绕骷髅而展开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之《起死骷髅:从庄子到鲁迅》(2014年)。(大木康)

二 先秦、汉

在中国文学的日译本不断刊行进程中,《诗经》和《楚辞》日译本的脱销与绝版颇为引人注目。在活力纷呈的中国古代研究中,与历史、思想、语言不同,与文学相关的成果很少。古代文学研究究竟是什么状况,应如何为之?

牧角悦子《经国与文章——汉魏六朝文学论》(汲古书院)这部著作,从贾谊的赋到《文选》序,讨论的对象丰富多彩,附录中的《面向文学研

究者的挑战书》彰显出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此文原本是为渡边义浩《〈古典中国〉中的文学与儒教》(2015)而写的书评。

渡边的著作以后汉儒教的“古典中国”的确立为背景，论述了汉魏晋文学中儒教观念的渗透。牧角先生一方面评价渡边先生不局限于近代的“文学”观念，还着力根据对象来研究儒教“文”的观念，另一方面她强调这一时期的诗歌对于艺术表达本身具有一种“文学意识”，这与近代的“文学”观念颇有相通之处。

和久希关于牧角的书评(《六朝学术会报》20)以“20世纪是‘文学’的时代”这样富有启示性的语句开篇。二十世纪，各种文学全集的编纂非常兴盛，中国古典文学也终于离开训读体，被现代日语翻译所接受。《诗经》《楚辞》从传统的儒教解释中解放出来，被定位为中国文学的起源，在世界的古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学研究为这种普遍的文学价值的构建做出了贡献。受渡边的启发，牧角另辟蹊径，试图更深入地探究“文学”，其未经整理的思路可以说留下了一个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未来的研究如何推进和发展，是值得注目的。

矢田尚子著有《楚辞〈离骚〉解读——围绕悲剧忠臣屈原的人物像》(东北大学出版社)，她拒绝了传统解释，也拒绝了与萨满教相结合的现代的阐释，而将其重新定义为“王者之士”的故事，进而由此呈现出汉代将其重塑为悲剧忠臣的文学风貌。

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一方面从儒教的解释中解放了《诗经》和《楚辞》，另一方面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本来”的语境，从外部引进了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知识，由此可以通过古代歌谣，领略已逝的古代历史风貌，乃至人类心灵深层的强烈动因。但矢田尽量避免从外部带入语境的方法，恪守中国古代文献考证的实证治学方法。考论的范围不追溯到“离骚”之前，而是在后半段专门探讨汉代，由此体现不把文本作为古代文化复原的工具的态度，此为本书成功之处。另外，要想回答王者故事的基础是什么、楚辞是什么等问题，就需要另辟蹊径。

20世纪是文学的时代，同时也是“发现”古代的时代。因此现在研究古代文学，也就是如何面对和运用20世纪的知识体系。把20世纪的理念强加于研究对象的态度已行不通，把20世纪所追求的普遍知识单纯地当作过时的东西而埋葬，这个话题未免沉重。

在这里列举相关领域的两部著作。高桥绫乃的《张衡的天文学思想》

(汲古书院)将《思玄赋》作为失意文学,着眼于占卜场面和星座的列举,显现出巡游宇宙反观自我的意象。迄今为止的文学研究中,不消说虽然《归田赋》对个人世界的向往受到关注,此番却使我们再次领略与宇宙对峙的张衡的雄伟气魄。

王小林《古事记与东亚的神秘思想》(汲古书院)原属日本文学的研究书籍,作者还著有《日中比较神话学》(2014),对中国古代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除了文献学和神话学之外,还关注古代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动向,思考古代传承形式,这一研究视野,大大超越了以往的和汉比较文学研究,以及从东亚的视角看当今的日本上古文学研究的框架。(谷口洋)

三 魏、晋、南北朝

首先,川合康三、富永一登、釜谷武志、和田英信、浅见洋二、绿川英树(译注)《文选 诗篇》(一)(岩波文库)于2018年1月刊行出版,以此为发端,发行一直延续至2018年的《文选 诗篇》(四)。关于《文选》现代日语的译注,作为全译有《新释汉文大系》(明治书院)及《全释汉文大系》(集英社),作为摘译还有其他出色优秀的,但没有出自文库本的。由熟谙《文选》的六人共同完成的此译注,由于其易懂的翻译和简明扼要的注释,以及诗意明快的解说,《文选》之门向更广阔的读者世界敞开,对于《文选》研究来说,这是值得纪念之年。

《文选》中,诗是从卷十九“补亡”开始的,而译注则是按照卷序进行,每卷末设有专栏。不仅是译注,而且从第一册末的解说和每卷末的专栏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选》诗篇所展示的那个时期的文学真实面貌。尽可能保持原貌,既体现想要传达给现代读者的学术态度,又显示出文库本的作用,成功地展示了文学研究的水平所在。

牧角悦子《经国和文章——汉魏六朝文学论》(汲古书院)作为论著从正面致力于《文选》研究,因为已经言及“先秦、汉”这一部分,所以只限于叙述。不过,正如序章的标题所示,“从‘文’到‘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六朝的意义”,从“文”的观点来阐明“六朝”这个时代特征的方法是,在继承以往六朝文学研究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文”是什么,“文学”又是什么,以此打开新的研究视域。作者指出,《文选》成为后世权威经典的原因不是所谓的“文学性”,而是作为“文”的“实用性”,进

而引发思考“实用性”到底是什么，“文学性”又是什么，从这点上看可以说接近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

其次，栗山雅央《西晋朝辞赋文学研究》（汲古书院）全面研究了《文选》广为人知的杰作《三都赋》。这是一项全面的工作研究，其论述包括成立之前的流变，此后的都邑赋，赋的习字材料用纸，赋的注释和评价等，作者试图阐明《三都赋》的价值所在。作者选择辞赋文学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并试图通过多元的分析，综合文学、历史和思想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展示《三都赋》的真实面貌。这显示出作品研究领域已跃入新的阶段，已不再仅局限于“文学性”探究。

安藤信广《圣武天皇宸翰〈杂集〉〈周赵王集〉研究》（汲古书院）是对正仓院所藏《杂集》中北周赵王宇文招的文集摘录《周赵王集》的译注和研究。尽管史书上指出，赵王受庾信的影响很大，这本书最终揭示南北朝“文化接触”的真实面向，这不仅涉及文学修辞，而且还涉及佛教思想。

同样在池田恭哉的《南北朝时代的士大夫与社会》（研文出版）一书中，例如第八章“关于‘恒山之悲’——典故与用法”等，关注到对南北朝文学方面的交流，以及在日本的流播。（斋藤希史）

四 唐宋

唐宋段的著作有斋藤茂《唐宋诗文论丛 天葩吐奇芳》（研文出版）。这部著作讨论中唐到南宋时期的古典诗文，以作者为此新写的序“韩愈的革新”为起点，以李观、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苏舜钦、苏轼、王十朋为例展开论述，描绘了“中晚唐时期的诗人诗风的新变以及南宋士人的继承”。另有“附论”，包括“唐诗中的芍药形象”“关于杨万里诗文集《杨文节公集》”。作者关于唐宋演变的从容叙述，彰显出明确的文学史观。

关于唐诗的研究，矢岛美都子的《唐诗的系谱——名诗的本歌取》（研文出版），用“ ”这样柔软的笔触和熟悉的术语“出典”，来论述为什么名诗会被后世当作范本，实际上讨论新诗是如何产生的。正如作者所说，“用典”的确不仅仅局限于和歌，尽管作为诗作的方法早已被意识到，但研究往往将关注点转向追溯典故，作者全方位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独树一帜的。可以说文学的活动本身就是“用典”的连锁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给了我们不少启发。

松原朗编《杜甫与玄宗皇帝的时代》(勉诚出版)是一部论文集,共收录19篇论文,每位作者都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研究的视角,还从历史、思想、美术等多个角度,对杜甫的前半生及其时代进行了论述。整体由六个部分构成:“杜甫诞生的洛阳之都”“杨贵妃:装饰玄宗时代的倾国名花”“唐的对外政策(唐的国际性)”“杜甫的出仕与官历”“杜甫的文学——传统与革新”“杜甫交友”。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杜甫,甚至盛唐时代,都是确切而重要的视域。

关于宋代,首先应提及的是内山精也《宋诗惑问,宋诗能否表现“近世”?》(研文出版)。全书共24篇,450页,由四个部分组成:“宋诗能否表现近世——新诗人阶层的兴起与出版”“宋诗与江湖”“苏学余滴”“读书杂识”。前两部分显示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方向。特别是最初的两篇,《宋诗能否表现“近世”?——江湖派研究事始之一》及《宋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江湖派研究事始之二》,两者最初以论文《古今体诗的近世之萌芽——南宋江湖诗派研究事始》的形式发表于《江湖派研究》(宋代诗文研究会江湖派研究班《江湖派研究》第1辑),具有宣言的意义,彰显了作者个人研究和宋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作者对“江湖派”的关注,并不拘泥于文学流派,而是从“近世化”(“世俗化”“通俗化”)的大视野出发,所以对作为承担者的“非士大夫知识分子”、与出版业的关系、文学语言的嬗变等方面的考察趋向于对时代的总体把握。

而且,在第一部分末的“南宋江湖诗人的存在意义”中,江湖派研究被定位为打破文学史上传统的“下降史观”和近代的“进步史观”(流派交替史观)封闭僵化状态的契机,正如稍后在“元、明、清”(诗文)部分中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偏重于白话文学,也许可以通过“近世诗”这一“框架=价值标准”来加以超越。

关注宋代文学研究新潮流走向的学者,远不止内山一人。内山的《从诗集的自编和出版看唐宋时代诗人意识的变迁》是为东英寿编《宋人文集的编纂与传承》(中国书店)所作的总论。《宋人文集的编纂与传承》是以东英寿为代表的科研经费组成员(其他还有浅见洋二、萩原正树、中本大等)的论文集。以“文集”如何被编纂,如何被传承的问题为轴心,讨论各种“文集”和作品的编纂和传承问题,该书也超越了已有的框架,试图从整体上把握那个时代的文学和相关事件及其现象,堪称共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斋藤希史)

五 元、明、清 (诗文)

与戏曲小说(白话文学)相比,这一时期传统诗文研究相对较少。这是因为,在唐宋取得一定成就的(近体)诗在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也许是受作品价值不高之观点的影响,以及现存资料繁多而未整理导致研究的门槛过高。但是,如果是前者,那么以文言写成的散文研究应该更加繁荣才对,而关乎后者,戏曲小说则呈现出活跃的研究状况。诗文研究当然还是要立足于唐宋以前深厚的文学传统,因此会需要耗时费力而让研究者望而却步吧。

之所以如此考量,是因为看到海外研究元明清(包括民国)的优秀学术书籍陆续出版。以下仅示一例:李孝悌著、野村鲇子译的《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台湾学术文化研究丛书)(东方书店)是关于明清至民国江南文化史的精彩力作。原著2008年出版。作者游刃有余地跨越历史、思想、宗教、传统诗文、戏曲小说等藩篱,论述了历史的潮流、王朝的交替、民众和士人的实况以及作为意象的都市等,精彩纷呈。第一章“明清文化史研究的新课题”主要可以参考港台、欧美学者所秉持的问题意识。对于书中所涉及的各种英文文献,日本研究者应该分工合作对其内容有所把握。关于本书,另可参见大平桂一(《中国21》50)、武田雅哉(《东方》461)的书评。

另外,日本学者扎实稳步地推进着研究,从文学以外的周边领域研究来逼近诗文,这就是近年来的特征。例如,小路口聪编《良知的对话——王龙溪的良知心学与讲学活动》(研文出版)所收内田健太《唐宋派和公安派诗学——以王龙溪为基点》一文,是对所谓唐宋派与公安派相关联的内在逻辑的研究与考察。以明代良知心学的研究为基础,将日本汉学也纳入研究视野,细致的文本解读打破了思想、文学的壁垒,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不仅限于本论文,对王畿讲学活动的探讨,此后的研究有可能延伸发展到各个领域。

从史学、文献学研究方面切入的是野村鲇子编《列朝诗集小传研究》(汲古书院)。仅从书名来看,此书有可能被误解为是诗集版本研究的一种,但实际内容是以史的考证为基础的文学研究著作。这是一部超过800页的大著。钱谦益《列朝诗集》收录有明一代诗人的作品和小传,是一部对后世

明代文学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献。众所周知，钱谦益对资料有意识地取舍和篡改体现了其编纂宗旨。本书从中选取了40余名代表性诗人的传记，并利用文献资料和其他别集等进行了细致的历史考证，同时还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最终的结果，不仅厘清了钱谦益编纂的实际，而且使明代诗人的基本文学面貌得以还原和彰显。如考察和研究明代文人及文学，此书可提供便捷的参考。

大木康的《冯梦龙与明末俗文学》（汲古书院）虽然与后述的“元、明、清小说（戏曲）”亦有关联，一并在此介绍。全书由第一部“冯梦龙人物考”、第二部“冯梦龙作品考”、第三部“冯梦龙与俗文学之环境”组成，论述明末通俗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冯梦龙以及当时俗文学的环境和背景。作者的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在第一部充分运用史料，梳理冯梦龙的交游、事迹、评价，刻画突出了其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二部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考察冯梦龙作品的编纂意图、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等。第三部分围绕冯梦龙的文学环境和背景，考察如读者问题、庶民文化问题等。作者认为，诗文和戏曲小说表与里应该是一致的，专著的第一部和第三部在宏阔的视野下对江南文学进行了分析。本书不仅涉及冯梦龙个体的文人研究，还交织文献学、社会史等研究，是一部展示宏大文学风貌的力作。（田口一郎）

六 元、明、清（小说戏曲）

大贺晶子的《明代短篇小说与戏曲的研究》（汲古书院）是一部探讨元至明代文学作品的论文集。其本科毕业论文以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为研究对象，以此为开端，现将研究领域扩大至白话小说和戏曲，可以说是一部打破文类的藩篱，跨元明文学作品的研究论集。

伊藤晋太郎《关帝文献的研究》（汲古书院）是对元代以后大量编纂出版的“关帝文献”的研究。这里的“关帝文献”，是指如元代的《新编关王事迹》、明代的《关帝祠志》等将关羽/关帝的传记、传说、关羽/关帝相关的评论和诗词等收集起来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是关涉关帝信仰的重要资料，也与小说《三国志演义》密切关联，由此可以进一步拓展《三国志演义》的研究视野。

仙石知子《毛宗岗批评〈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汲古书院）是继《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像研究——以族谱分析为中心》（2011年）之后的又一

著作。作者另有《〈三国志〉的女性形象》(2010, 合著), 而在此作者针对《三国志演义》通行本毛宗岗批评本这一版本, 阐明其评点中呈现出来的女性观、家庭观。这部著作于2017年12月刊行出版, 这里也不妨一提。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未来——21世纪的回顾与展望》(勉诚出版)是2016年神奈川大学举办的同题专题研讨会的记录。延续至今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最初的活动是1987年的野边山合宿, 时光荏苒, 转眼即是30年的岁月。这期间, 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深入, 古典小说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书既是对这30年研究的具体总结, 也是思考未来研究如何拓展的好资料。在中国, 复旦大学的黄霖教授举办了回顾80年代小说研究的聚会, 并出版《我们起跑在20世纪80年代》(2016)。通过此书, 可以了解中国三十年学术研究的轨迹和动向。

二阶堂善弘监修、翻译, 山下一夫、中冢亮、二之宫聪翻译《封神演义》(勉诚出版, 全四册)中的第三卷、第四卷已于2018年出版, 至此此书全部出版完成。另外, 还出版有田中智行翻译的《金瓶梅(上)》(鸟影社)。如果提及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 岩波文库和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等都有出版, 阅读这些已足够充分, 应该可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但是翻译也有所谓的学术有效期, 而且研究一直在向前推进, 因此新的研究成果的翻译也很必要。《封神演义》是首次具有真正学术背景的翻译, 而《金瓶梅》则将至今为止删减的内容全部翻译完成, 同时参考美国芮效卫(David Roy)的英译, 新增添了不少丰富的内容。因此可以说, 2018年是古典小说翻译的丰产之年。此外, 2019年3月,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在早稻田大学举行了“中国古典白话文艺的再生——翻译、翻案的历史、现状、展望”研讨会。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在海外, 韩南(Patrick Hanan)的遗稿 *Quelling the Demon's Revolt* (2017, 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的英译), 何谷理(Robert Hegel)的 *Idle Talk under the Bean Arbor* (2017, 《豆棚闲话》的英译)等相继出版, 这些可谓盛况空前。

《竹村则行 井上泰山 小松谦卷》《福满正博 冈崎由美卷》(大象出版社)作为康保成主编的“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学家自选集”系列中的著作也相继出版面世。此为包括中国及欧美等世界范围的中国戏曲研究者的自选论文集。作为出自日本学者的海外传播成果, 这样书籍的出版无疑是受欢迎的。(大木康)

七 近现代

2018年近现代文学研究有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如《中华文艺的飨宴》(研文出版),正如其副标题“《野草》第一百号”所示,是作为单行本出版的中国文艺研究会会志《野草》第一百号的纪念版。中国文艺研究会主要是由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者组成,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本论文集共有14篇论文,从执笔者的遴选到论文内容的编辑,都有严格周密的考量。鉴于立志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的危急状况,为了激发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趣,在年轻人及中坚学者中挑选出执笔者,在允许和鼓励论题丰富多样的基础上,要求所有的作者都要具备“文学史的视野”。因此,这14篇论文各擅胜场,其各自的研究以不同的形式在以往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视野。

《幻境》(中国文库)是一本与其不同的知名的研究者的同人刊物。创刊号刊登了出铁男、坂井洋史、小谷一郎、下出宣子、谷行博、中井政喜等7位同人学者的论文和翻译。正如下出先生所说,在杂志名“幻境”中,寄托着对超越瞬间“时间”的“希望”之渴望。这也是对近来日本的中国研究,甚至日本的言论状况被限制在狭窄的“时间”里封闭状态的批判。虽然每篇论文的主题和风格各异,但都基于自己迄今为止的学术探讨和研究成果,坚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与当下言语状况紧密关联的强烈意识,显现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复苏的积极性和方向性。

《跨境中国文学》(东方书店),是为纪念藤井省三先生在东京大学退休而由学生撰写的论文集。论文集共收入27篇论文,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鲁迅与同时代人”讲述了鲁迅和鲁迅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二部分“文艺市场的成熟与文学空间的变容”是超越文学文本的文化研究,第3部分“追寻文学的谱系”主要是论述身份认同识别的论文,第4部分“加速的文学与影像的交涉”收录了关于电影和近年来流行文学的论述。这些都是藤井先生开创的领域,同时也是近年来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以各种形式进行讨论的主题。

作为单著,首先要推荐的是中岛长文译注的《周作人读书杂记》全五册(平凡社、东洋文库)。凡例中写道:“从周作人的全部著作中,选择并翻译了关于他的读书及相关书籍的文章。”虽然是翻译,但文章的选取显示

了中岛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和底蕴,而且每一卷都附有详细的“后记”。内容从阅读论开始,全面梳理了周作人对历史、地理、神话、民俗、医学、绘画、女性、儿童、日本文学、西洋文学、中国新文学,甚至古典诗文、风俗文学等丰富多样的兴趣。众所周知,对周作人来说,书籍具有特别的意义,本书以此为主轴,试图诠释周作人的一生。

如果论及翻译还可推荐此例,饭冢容编译的《作家们矢志不渝爱着的中国》(中央公论新社)。他选取高行健、余华、阎连科三位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中国作家为对象,分别以采访、对谈和演讲的形式展现他们的文学风貌。通过三位作家的介绍,本书在传达他们文学世界的同时,还试图揭示中国社会的真实本质。选择这三位作家的学术眼光毋庸置疑,同时还以采访、对话和演讲录音的形式收录作品来展示其中的魅力,这是编者选择的关键和重点所在,可谓独具慧眼。编者近年来以积极以及令人惊异的速度推进着同时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本书体现出其学术积累的丰硕成果。

出版的专著有小山三郎的《鲁迅》(清水书院)。作者从政治学的立场出发,研究了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政策和台湾地区的文艺政策。本书特色有二:第一是通过使用日记,使鲁迅的日常生活得以浮现,同时深入鲁迅的内心世界;二是侧重于作为古典文学家的鲁迅。实际上这本书是林田慎之助先生主编的,小山显然受到林田《鲁迅中的古典》(1981)的启发而作。小山将鲁迅的精神深层和其作为古典文学家的特性结合起来,例如论述鲁迅对魏晋文人的思考在其作家人生中所具有的意义。有些观点迄今为止已有学者论及,但从这个角度综论作家的生活,亦可视为本书的特色。

在文化研究方面尚有星野幸代的《日中战争下的现代舞蹈》(汲古书院)。本书是日本第一本关于中国近代现代舞的专著。此书超越了中日战争和时代的格局,讨论了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还包括日本、朝鲜半岛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流动的现代舞。在作者看来,当时的现代舞蹈是某种宣传。本书在关注现代舞和权力之关系的同时,注重舞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论述了各地展开的现代舞的动机和背景。作者是中国文学研究出身,因此即使在论述现代舞的此书中,也从与文学相关的开放的文艺学角度进行了讨论。

毋庸置疑,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已经在该领域有长足发展,武田雅哉编的《摇曳的乳房,丰硕的乳房——乳房的图像与记忆》(岩波书店出版)是以“乳房”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以编者武田为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等的研究人员共同协作,进行了关于中国、俄罗斯、日本乳房的比较文化研究。关于中国,武田从图象学的视角撰写了乳房的文化史,滨田麻矢论述了现代文学中乳房的表象,田村容子论述了近代中国京剧中男旦的身体。也就是说,本书是集图像学、性别论、身体论等多种视角同时与日本、俄罗斯、西方等横向比较之纵横交错的研究成果。

最后,想列举的相关成果还有日本近代文学的成就。近年来,在日本文学研究方面,“外地”的日语文学研究取得了飞跃性进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主要研究了伪满洲、台湾地区的文学活动,不过近年来日本文学研究新资料不断被发掘,研究更加深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2018年的成果,日中战争末期在上海发行的日语综合杂志《大陆》被秦刚发掘,发表于《早稻田文学》2018年初夏号。战争期间留在上海成为当地中国文坛重要人物的陶晶孙也曾在《大陆》刊载文章。对于这个领域,迄今为止,学界从殖民地文化研究和上海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了共同的研究,但仍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高桥和巳的文学和思想》(石炭袋出版社)是一部全方位论述战后日本文学研究者,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者高桥和巳的论文集。关于中国论,池田恭哉论述了高桥的阮籍、嵇康研究,关智英论述其小说描写中所呈现的伪满洲国占领地的眼光视角,张竞试图重读高桥对“文化大革命”的视察与记录,戴燕从中国的立场总结了高桥的一生,王俊文以其与竹内好、武田泰淳的关系为轴心,在中国文学的谱系中对高桥予以定位。与近年来对竹内和武田的研究相比,对于高桥和巳作为中国研究者的研究只是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今后还有待深化。关于高桥和巳的研究,另有《桃之会论集》8(高桥和巳专集)(桃之会)。

(铃木将久)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